

吕庭美 夏玉润



L.41

希望之路

——凤阳大包干的由来

希望之路

——凤阳大包干的由来

吴庭美 夏玉润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8年8月·合肥

希 望 之 路

——凤阳大包干的由来

吴庭美 夏玉润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375 字数：75000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198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212-00077-9/F·13

定价：0.95元

BAN 26/06

序

大包干，大包干， 直来直去不拐弯；
保证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

在当今中国农村，有谁不知道这首闻名全国的《大包干歌》呢？！又有谁不知道这首充满着社会主义色彩和中国传统风格的淳朴的旋律，首先是从凤阳农民口中唱出去的呢？！

《大包干歌》是凤阳人民自解放30年来，用自己的血汗和泪水凝成的一首民谣。它和闻名中外的“说凤阳，道凤阳，……十年倒有九年荒”那首《凤阳歌》一样，流传在祖国的山南海北，天涯地角，穷乡僻壤，通都大邑，为全国人民所传唱。《大包干歌》将和《凤阳歌》一样，永远载入凤阳和中国的史册。

凤阳大包干的出现，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彻底地解开了捆在凤阳人民身上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十年九荒”贫穷的绳索，使凤阳的农村经济在短短的几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更重要的是，这种生产责任制“统一了全中国”，在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为中国的改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这样一个震撼中外、得到了人民和历史肯定了的重大事件，我们的报刊虽然为此作了大量的报道，出版部门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著作，但是至今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全面地、具体地、忠实地记录下来却为数不多。本书作者花费了近

两年时间，收集资料并编写了此书。他们以极其通俗的语言，并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凤阳大包干的形成进行了认真地总结和详实地记录。

凤阳大包干的诞生，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孕育了30年的悠长岁月。因为大包干和互助组时期的“按件记工”、初级社时期的“包工制”、高级社时期的“三包一奖”及1961年的“责任田”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要想了解大包干的全过程，必须从解放初期开始谈起。作者在书中采用了远略近详的方法，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仅作提纲式的记录，而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史，则给予详尽记载。

中国之大，大包干为什么较早地产生于凤阳？是偶尔的吗？不是。它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大包干的产生，除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方针的指导下，在中共安徽省委和滁县地委的支持下这两个大前提下，凤阳县解放以来30年的命运，大包干到户的发源地——凤阳县小岗村的命运，以及中共凤阳县委领导班子的命运，和我们的祖国、我们党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艰难岁月。该书通过对个人、对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县的解剖，阐述了凤阳大包干形成的全过程是人民和历史前进的必然产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凤阳，在全国2000多个县份中，是一个很典型很有色彩的地方。它的典型和色彩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这里出了一个开国皇帝朱元璋；二是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用血泪凝成的民间艺术——凤阳花鼓；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创造了大包干。以上三点，表明了在封

建社会中，这里曾演出过风樯阵马、回肠荡气的壮剧，而在当今社会中，又演奏了一曲连云裂石、波澜壮阔的交响乐。这些特点，在我国其他县份中是十分罕见的，这就必然地提高了凤阳在全国的知名度。正因为凤阳历史如此典型，所以可以说，凤阳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缩影。本书在全面介绍大包干形成全过程的同时，还对凤阳农村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作了阐述，通读全书，这对管窥我国农村自解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指导今后的农村工作，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本书收录了为数不少的凤阳民谣。作者在编写该书过程中，曾专门深入乡村收集民谣，并将这些民谣巧妙地有机地择入书中。民谣，大多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它以简短的语言形式反映出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思想感情和愿望，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简练深刻，堪称语言中的精华，素有“智慧花朵”、“词库中的钻石”之誉。民谣的收录，为本书生色。

我和两位作者均是土生土长于凤阳的同龄人。对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时期的往事，有隐约的记忆。1958年的大跃进、1960年的困难时期，正是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期，许多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后来，我有幸工作于凤阳县委办公室，所以在凤阳推行大包干的时候，能和县委领导形影相随，跟从他们经历和目睹了这场意义深远、风波迭起的改革的全过程。当我得知两位作者编写此书时，便把自己保存的材料和所知道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了他们，为本书的真实性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陈怀仁

1987年11月于凤阳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一) 农业生产互助组.....	(3)
(二)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5)
第二章 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	
(一)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4)
(二) 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	(20)
第三章 责任田的兴亡和农村经济的恢复	
(一) 责任田的兴起.....	(25)
(二) 责任田的改正.....	(29)
(三) “四清”运动和生产责任制的建立.....	(30)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凤阳	
(一) 农业学大寨.....	(33)
(二) 家庭副业的插曲.....	(36)
(三) “文革”中的农田基本建设.....	(38)
第五章 凤阳的大包干	
(一) 动乱后的反思.....	(40)
(二) 新县委书记的到来.....	(44)
(三) “一组四定”定额包工的管理和实施.....	(47)

(四) 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	(51)
(五) 大包干到组	(57)
(六) 包干到户的先声	(64)
(七) 包干到户的推行	(73)
(八) 大包干的完善与扩展	(83)
(九) 大包干带来了大变化	(88)
后 记	(99)

楔 子

公元1949年1月26日，在淮海战役胜利号角的吹奏下，在一阵阵欢腾、狂喜的鞭炮和锣鼓声中，一支400多人的解放军队伍，踏着雄壮威武的步伐，跨入了凤阳城。凤阳宣告解放了。崭新的凤阳历史的一页，从这里掀开了。

共产党人在一阵胜利的欢乐和成功的欣喜之后，沸腾的心潮逐渐地平息下来。因为，此时他们手中的凤阳，在长期战乱和灾害的凌辱下，荆棘丛生，饿殍遍野，疮痍满目，衰飒凋零，呈现出一片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景象。首先，是封建社会残渣余孽的势力，仍然象绳索一样，捆束在凤阳人民的身上。解放前夕，土匪、恶霸、反动道会门、反动党团组织和盘根错结的各种封建势力，遍布凤阳。凤阳城内的安青帮头目有徒儿徒孙2000余人，大多是地痞、流氓、赌棍、匪盗，他们上和国民党军队勾结，下和盗匪串通，鱼肉人民，祸害乡里。凤阳东乡有“八只虎”，他们奸淫抢掠，敲诈勒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南部山区的匪霸横行山里。此外，红心区、大溪河区、武店区、长淮区都有一批地头蛇和恶棍，凤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其次是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早在明清两代，凤阳便以“十年倒有九年荒”而著称全国。解放初期，凤阳土地荒芜，满目榛莽，人丁稀少，十室九空。1949年，凤阳沿淮一

带的大水，吞没了约15万亩良田，岗地上的旱灾、虫害也接踵而至，受灾的耕地约占全县总耕地的三分之一。1950年，自然灾害更加猖獗，暴涨的淮水冲垮了淮堤，致使35万亩湾地沉浸于汪洋之中。位居于丘陵地带的红心、鹿塘、殷涧三区，又受到了风雹的扫荡，使得近2万亩农作物遭到严重损失。据统计，1949年秋天，人口仅有33.2万余人的凤阳县就有6万人断炊；1950年春天，断炊人口为15.5万，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到了1951年麦收前，竟有28万人断炊，约占全县人口的80%。

人民民主政权的幼苗刚刚破土而起，便受到了封建统治、灾荒、贫困、饥饿的袭击。如何医治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创伤，历史的重任便落在共产党人身上。

凤阳解放后，减租减息便是人民政权在凤阳进行的首次运动。接着，又进行清匪反霸、生产救灾、镇压反革命运动等，稳定了社会秩序，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1951年夏，凤阳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翻身农民雀跃，欣喜若狂。他们高兴地唱道：“土地证拿到手，快活得屁股扭三扭，分田地，分房产，又分粮食又分牛，告诉地主你别生气，你看看，县长的大印盖上头。”土地改革运动调整了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土改以后，分得土地的风阳人民迸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在短短的两年中，凤阳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16023万斤，比1949年增长60.5%，油料的增长幅度更大。随着粮食的增长，凤阳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提高和改善。此时，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开始了。凤阳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第一章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一) 农业生产互助组

土地改革后的凤阳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主经济已被完全消灭，旧式富农经济实际上也不存在，贫农的经济地位显著上升，雇农也成了个体小生产者。贫苦的风阳人民正怀着极大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

然而，凤阳毕竟是个十分贫穷的地方。土改后的农村虽然得以恢复，但这里的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料极度匮乏。成为个体小生产者的贫雇农，只能在风平浪静的航道上，慢慢地扯起风帆，小心翼翼地随流顺风而进，稍有风浪，他们就会感到航程艰难。据当时对武店乡灯上刘村的调查，1953年，因小麦受寒霜侵袭，平均亩产仅30斤。全村220户，其中贫雇农55户，中农146户，富农7户，地主1户，小土地出租者1户。贫雇农中，因天灾人祸而借债的有5户，卖地的5户，出去帮工的13户。中农中间也有4户下降为新贫农。

凤阳县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是于1950年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土改后的凤阳农民，由于生产条件的极端落后，并时有灾荒的威胁，因此大多数农民一方面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又有走社会主义互助合作的要求。中共凤阳县委积极领导农民组织了农业生产互助组。互助组主要有临时性和常年性两种形式。

临时性的互助组在凤阳农村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各户土地、劳力相差不多，伙起来一齐干，不计工不换工。这种形式大多是春、夏、秋三季互助，冬季解散。二是以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三是抗旱、抢收抢种时，每家抽出同等劳力，轮流到各户劳动，不记工算帐。临时互助组的特点，按凤阳农民的话来说就是：“说干就干，说不干就散”；“行动自由，上街方便”；“工抵工，吃亏讨巧在心中”。它的好处是：“户数少，好领导，问题易解决”。群众对这种形式的互助组歌唱道：“工抵工，人换牛，到了农忙不用愁，你帮我，我帮你，又有柴禾又有米”。

在常年互助组中，武店乡陈学孟组是办得较好的一个。1951年武店乡高粱田内普遍发生了虫灾。县人民代表陈学孟组织数户农民集体捉虫，在捉虫的过程中，使群众认识到了组织起来力量大的这一道理。这样，一个15户的常年互助组成立了。陈学孟被选为组长。刚刚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缺少经验，干活不记工，不算帐，大呼隆，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积极性。陈学孟从报纸上又学习了新的经验，把旧的流水帐改为工票制，每天记分，每季结算工帐，付清工资，群众感到这样做法比较公平合理，互助组有了起色。

陈学孟组还实行民主管理，制定工作计划和各项制度。规定每晚开一次评工记分小会，7天开一次检讨会，每3个月开一二次生产总结会。陈学孟组为全县的互助组作出了表率。

凤阳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前进中虽然道路坎坷，但它在解

放初期生产资料极度匮乏，抗拒自然灾害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却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实践证明，大部分互助组比单干在农业生产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互助组在农村中产生了吸引力，使得不少农民纷纷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要想庄稼长得好，就要往互助组里跑”；“互助组，互帮忙，贫苦农民有方向，不怕劳力弱，不怕牲口羸（即牲口弱的意思），只要齐心合力干，成袋的粮食往家扛。”这些民谣，表示了农民对互助组的向往。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农业生产互助组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在凤阳农村发展着。1950年，全县仅有几百个互助组，到了1952年，就发展到4723个，占全县总农户的41.5%。

“云似舞，水如歌，笑呵呵”。解放后的凤阳农村光风霁月，田野上一片欢腾。互助组里的农民们5人1组，10人1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抢种季节，人们拉着步犁，在自己刚刚分得的土地上来回奔走。陈学孟组的十几户组员，独出心裁，他们一律穿上了统一制作的短袖条子布小褂，在田野里劳作，显得格外生气勃勃，龙腾虎跃。凤阳人民在“爱国增产，互帮互助，组织起来，由穷到富”的口号声中，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去描绘美好、幸福的宏图。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2年，凤阳县的农业生产互助组虽然得到飞速的发展，但仍然约有60%的农户从事个体生产。在已组织起来的互助组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使互助组在凤阳农村更快、更好地发

展，1952年7月，凤阳县委在全县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决定：全县各地的互助组发展工作要立即停下来。目前的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和巩固上面去，使之逐步定型。对互助组较少的区、乡，也应以巩固提高为主。如农民确有强烈的互助要求，也应有控制的发展。这次会议，使全县的互助组从发展阶段转入了巩固和提高阶段。1952年10月，农业部召开了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从1953年起，全国大力发展互助合作组织。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同年11月14日，凤阳县委发出了《为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从此，凤阳进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办阶段。

从1952年12月下旬开始，在县委直接领导下，首先在全县范围内选出了7个常年互助组做试点，试办初级社。它们是：凤城区李国坤组，长淮区朱学悟组，刘府区张士俊组，武店区陈学孟组，大溪河区丁侯杰组，鹿塘区张成茂组，红心区乔茂义组。

初级社不同于互助组。互助组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它的土地、耕畜、农具归各户所有，只能按照各户的生产要求从事共同的劳动。因而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只能称为“社会主义萌芽”。而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社员的私有土地必须作股入社，实行统一经营；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要入社统一使用，取得相应报酬，或作价归社，由社分期偿还价款；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并按照劳动和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以社为单位进行统一分配，土地的报酬一般低于劳动报酬，采用土四劳六的分配方法（即土地占四成，劳动占六成）。初级社是中国农村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

在初级社成立的过程中，关键是如何搞好土地入股，耕牛、大型农具入社问题。为此，初级社成立了评产委员会，根据各户土地的多少、土质的好坏、离村庄的远近、水利条件等各方面条件，最后出榜公布。对土地上的青苗，采用“青苗归社，付给工分或代金”的办法。耕畜入社的方法是，“折价归社，专人喂养，分期付还”。大型农具亦采用折价入社处理的办法。

初级社成立后，建立一套组织、生产制度。初级社的劳动组织，根据本社劳力的多少，成立若干个劳动小组。评工记分一般仍采用互助组所实行的“死分活评”的方法，每个劳动小组选出1名记工员。初级社配备会计1人，负责全社的财务工作。

1953年，凤阳县第一批试办的7个初级社均获得了丰收。城西乡前进农业社（即原李国坤组）几年来粮食产量持续上升，1952年，全社粮食产量为48365斤，平均亩产225斤；1953年粮食总产为63146斤，平均亩产293斤；1954年粮食总产73004斤，平均亩产379斤；1955年粮食总产增加到83000斤比办社前的1952年增长72%。凤阳县的初级社试办工作获得了成功。

从1954年，凤阳农村掀起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出现了两个先进典型：城西乡党支部和农民陈学孟。他们都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称赞。

城西乡党支部在合作化高潮中，支部书记亲自到干部工作能力较弱、问题较多的留守司选区蹲点，向群众进行总路线和阶级路线教育。党支部在办社过程中，注意培养骨干力量（主要是贫农），树立他们的工作威信，有计划地发展党

团员，树立以贫农为主体的领导核心。1954年，他们共发展党员14人，其中贫农占11人，全乡30个合作社的93名正副主任、会计中，51人是党、团员，余下的有24人是贫农。

城西乡党支部采用老社带新社、强社带弱社的办法，把全乡13个较好的社分布到7个联社中去。党支部6名委员实行了包社、包队、包组责任制。在劳动中他们创造并推广了“包工制”。在分配中采用“土四劳六”的方法，帮助各社进行秋收分配。他们还学习了先进生产经验，推广了小麦优良品种，使城西乡获得了农业丰收。

城西乡党支部在农村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1955年6月11日，中共凤阳县委农村工作部以《一个值得推荐的模范支部》为题，将该支部的模范事迹加以总结。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城西乡党支部作了如下评价：“这个支部的工作路线，无论从哪一个面来说都是正确的，值得向一切在农村工作的同志推荐。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

陈学孟，贫农成份，烈属，共产党员。1952年12月，他在武店区第一个办起了合作社。陈学孟在办好自己社的基础上，积极帮助群众办社。自1953年春到1954冬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和他领导的农业合作社，帮助群众办了80多个社。其中陈学孟亲自帮助办的有15个社。

陈学孟帮助群众办社的方法有如下几种：请群众进自己社里来学习；自己出去帮助群众办社；教会本社的同志如何帮助群众办社；用本社的力量，帮助社外的群众解决困难，吸引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利用联社委员会（陈学孟是联社委员会主任）的名义来推动群众办社。

陈学孟在帮助群众办社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如了解情况，对不同阶层的人进行不同的教育；培养干部，主要是培养好妇女干部；正确执行合作社和群众的互利政策；制订生产计划和劳动纪律，建立帐目。

1955年，凡是经过陈学孟帮助组办的合作社都增产2—4成。群众都说：“陈学孟是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的社象个大学堂，大家都看他的样子，跟他学”。为此，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陈学孟作了高度评价：“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1954年，凤阳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第一个高潮的年头。在这个高潮中，既出现了象城西乡党支部和陈学孟这样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凤阳人民仅靠自己的热情，在几千年来从未曾走过的合作化道路上摸索着，这就必然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在办社中违背了“农民自愿”这一根本原则，用强迫命令的手段代替了说服动员的方法。

二、群众入社后，一些干部采用剥夺的手段，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在土地评产和耕牛、农具折价入社时，普遍把产量和价格降低。有的地方排斥贫困户，公开宣布不吸收贫农入社，对中农则采用严重损害中农经济利益的手段，强迫他们入社。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农民将自己的猪、牛杀了，他们说：“拿起刀，泪珠流，牙关直咬手乱抖，八十块钱一头牛，入社才评五块六；横了心，杀了牛，又落（得）牛皮又落肉，拿到集上去出售，至少能落三十六”。